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88 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这些谈话收录到《邓小平文选》时定名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以下简称“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南方谈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针对性强，且语重心长、娓娓道来，读后令人如沐春风、深受启迪。

抓住时机，加快发展

南方谈话思想丰富，涉及问题广泛，其核心观点是：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提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之所以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发展主要是发展经济，而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经济实力问题。国际竞争，说到底就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不仅谈不上到国际舞台上竞争，还会经常遭人欺负。我国近代的历史和当代世界的现实都清楚地表明，经济落后就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受欺辱，长期贫穷就会被时代淘汰。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得到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国际上支持我们的朋友才会更多。我们在国际上腰杆子才能更硬，国际地位才更高。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为什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因为它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之所以说它正确，是因为它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 40 多年的实践所证实。

1978 年以来，在这条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地位明显增强，国际影响迅速扩大。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那样：“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对此，邓小平还强调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来，无论形势怎么变化，我们始终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凝聚共识、攻坚克难的根本政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是生命线，路线决定命运。党的基本路线决定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是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能割裂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邓小平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

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遵循着党的基本路线，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点

对于如何推动改革开放，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改革开放中迈不开步子，不敢试，不敢闯，说到底还是思想上理不清姓“资”还是姓“社”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提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破解改革过程中抽象地谈论姓“资”姓“社”困惑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用生产力标准、国家综合国力标准、人民生活水平标准来衡量改革的成败得失，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了扫清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邓小平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本质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构想路线，“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率先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

的问题”，可以通过让发达地区“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要把我国建设成发达国家

在南方谈话的最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是邓小平的谆谆嘱托！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邓小平毕生的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他思考问题、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打开国门，让中国汇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之中；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坚决支持开辟经济特区，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推动发展市场经济；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我们牢记邓小平的谆谆嘱托，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集中精力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是一条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4 期目录

本刊专稿 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以城市基层党建为视角	潘 维
专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伦理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养成机制 组织驱动宣传：再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宣传网建设 中国共产党反帝理论的形成与发展（1921—1937）	李建华 陈文娟 史泽源 张治江
马克思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重构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关于精神的哲学解读 马克思“美好生活”观及其中国意义	徐海峰 周梅玲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的政府职能转变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中国逻辑、现实挑战及未来之路	李军鹏 贺海峰等
经济学 “十四五”规划纲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研究 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 ——生产资本形式的国有企业与货币资本形式的国有资本关系研究	许宪春等 沈尤佳等
社会学 时代变迁、制度创新与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 后小康时代中国贫困问题转变及反贫困战略转型	李迎生 邢梓琳等
法学 论党政联合发文的制度属性 多元主体互动的法治文化建设	秦前红等 王曼倩

《行政管理改革》2021 年第 8 期目录

【本刊专稿】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础、思想演进与实践逻辑	张占斌等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百年探索	谈火生等
【乡村振兴】 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前沿问题 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看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实现	黄承伟 李云燕等 刘雪梅
【文化管理】 “十四五”时期文化新业态发展的战略语境、历史机遇与行动路线	王林生 李海龙
【政府管理创新】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碎片化治理：基于多省的调查材料 从货币竞争视角看央行数字货币形态的发展 数据安全和产业发展双重视角下的自动驾驶数据规制	徐国冲等 向坤等 李若兰
【学术动态】 觉醒与超越——“百年大党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研讨会摘英	陈偲

（上接 4 版）没想到，习书记到上海以后，就想起两年前来我和他在车上交流的情景。他对我说：“你当时在车上给我讲的欧洲长子继承权问题，我后来还专门请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这让我感到意外，说明习书记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又非常有心的人。这是我与他的第一层缘分。

第二层缘分我们都是知青，曾经有很长时间的插队生活经历。有一次习书记说起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他说，“文革”初期离开北京去“大串联”，第一站就到了上海，品尝了阳春面，还到国际饭店去看了看。后来，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到陕北梁家河插队，受到了当地淳朴老百姓的关爱。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担任大队书记，帮农民搞沼气，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还获得了先进称号。我在江西吉安地区的新干县插队 11 年，农村所有的事情都经历过，对习书记讲的事感同身受，也非常能够体会他对中国普通农民的那种朴素情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始终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可见他的为民情怀根深蒂固。

第三层缘分可能就是我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从事决策咨询研究，对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有一定的了解，与习书记共事的时间虽短，但他很善于听取意见和建议，有时还会

聊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种信任感，令我十分感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上海以后，您和他见过许多次面，您后来做的很多工作依然是围绕他的要求部署来开展的。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王战：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后，认为上海在许多方面做得比较靠前，经常会请上海的一些干部建言献策，或是让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到上海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所以这不是对我个人的认可，而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卓有成效的一种体现。我参与的工作主要有这样几项。

一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我从 2007 年开始参与，除了 2009 年生病不去，一直参与到现在，包括 2017 年经济工作会议。一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不仅是中央有关部门参与，也会从我国东中西部找几个有代表性的省市的同志一起参与，目的是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地方发展实际的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每次起草工作开始时，中央有关负责同志都会给大家讲习近平总书记的主要思路和要求。在讨论过程中，我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多提地方上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从来不讲大话和套话。

二是人大方面的工作。我从 2008 年开始当了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有

机会在每年 3 月份和习书记见上一面。他每年在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总是不断为上海出题目，与时俱进地对上海发展提出一些新的更高要求。我也积极履行全国人大代表职责，在人代会上建言献策。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2014 年，我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提了五条建议。在那一年春节前，上海社科院做了一个调研，向 139 位国内外专家发放问卷。结果显示，大家对过去 3 个月国家出台的 12 项改革中的 7 项评价良好，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党风廉政建设、单独两孩、废除劳教、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成立上海自贸区。也有反映不佳的，比如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我觉得这项改革方向是对的，问题是落而不实。说到这里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就拿起笔认真做了记录。我接着说，老百姓看重改革如何落实，以此来评判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通过改革不断巩固改革共识。国家要有统筹全局的深化改革时间表，现在说是有时间表，但还是比较粗的。

我当时还说，我们统计到共有 339 个改革项目，一下子推出会造成“交通拥堵”。建议第一阶段按照先易后难原则、最大公约数原则、瓶颈原则安排改革事项。这时候，习总书记放下笔，微笑着纠正我：“不是 339 项，是 336

项。”随后，他转身对一起参加上海团审议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讲：“王战同志刚才提的五条建议‘照单全收’，择善而从之。”

参加两会审议的这几次，每一次见到习总书记，他都会问：“最近身体还好吗？”“看你挺精神的。”我 2009 年患肝癌动了切除手术，第二天他就请秘书来电问候。他对其他人也一样亲切，每次讨论结束以后都要一一和大家握手，一边握还一边向对方询问近况，就像老朋友叙旧一样，体现他极强的人格魅力。

三是专家座谈。我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6 年两次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当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进行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对专家学者非常尊重，对大家的发言听得很认真很仔细，有时还会插话，问一些问题，和专家们互动讨论。2016 年那一次发言，习近平总书记说话说：“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王战同志就是帮我搞文稿的。”然后，他又转过来问我：“上海社科院现在也是国家高端智库吧？”我说是的，当时心里真是高兴极了，说明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地方的智库也非常关注，这极大鼓舞了我们上海社科院搞研究的同志们。

四是高端智库建设。还记得 2013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到我，握着我的手问：“身体怎么样？”

我说：“挺好，不错，向总书记报告，我现在到社科院工作了。”他一听，说：“多帮我做点战略性研究。”

2015 年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共有 25 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研究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思想、科技、军事、法律、国际各领域，有 10 家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机构，2 家是部委直属机构，占入选智库总数一半，只有 5 家不在北京，上海社科院占其中一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多次作出批示。中国本不缺智库，党政机关本来就有许多研究机构，高校也有很多研究所。但中央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就需要有更多建言献策能力强、含金量高的智库。

早在 2007 年，习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就充分发挥“一室三办”的决策咨询作用，所以我们特别理解后来他提出要建设新型高端智库的要求，也一直努力提高自身研究水平，争取推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任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和我交流过一个话题。他说，他在浙江待了五年，把全省大大小小的地市跑了一遍，认为浙江的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三教合一”。我当时听到这个观点感到很惊讶，第一次看到

一位市委书记对文化方面的工作这么重视。随后，我就策划世博会主题演绎之旅搞了个课题研究，到浙江专门作了考察，设计了七条世博主题旅游线路，然后写了一篇报告，赶在世博会举办之前报给他。这篇报告主要是研究“三教合一”对中国农耕社会时期江南经济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2009 年，我提了一个观点，唐宋两次大移民，大部分是落脚在江南的，“三教合一”实际上解决了移民的安身立命问题。道教解决了人与自然怎么相处的问题；儒教解决了人与人之间怎么和谐相处，包括村庄和村庄、宗族和宗族怎么和谐相处；而佛教解决了人的内心问题，怎么对待生死苦乐。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了，移民就实现了安身立命。这也可以从文化角度解释江南为什么在长达 600 年间始终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结果，已到中央工作的习书记非常重视，不仅认真看完，还作了批示。后来，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有关同志还就此来沪拜访过我。现在，上海社科院在智库建设方面成绩也比较突出，围绕中央的重大决策提供了不少材料。我们希望，上海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央决策提供可参考借鉴的依据，这不仅是我们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地方高端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干部的一份赤诚之心。